

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孔子纪

刘方炜 著



刘方炜 著

17



孔子纪

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纪:学术思想的启门与文化制度的创设/刘方炜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33-9010-6

I. 孔… II. 刘…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人物研究
②孔丘(前 551~前 479)—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77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0 字数:43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论 启门者

在孔子诞生之前,人类文明已经有了高度发展。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国家已经出现,制度已经形成,文字作为交流信息与承载文化的工具已经成熟。冶金技术也已经十分发达,在青铜器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铁器并开始广泛使用。但是,人类自觉地去探索世界、认识自身的成熟而完整思想体系还没有出现。这要等到三个伟大人物的诞生。在中国是孔子,开创了中国的儒学并直接引发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在印度是佛陀,开创了佛学。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思辨哲学的传统。这三位思想家诞生并活跃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又过了五百年,耶稣诞生。这个跨度五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被后人称为人类思想成熟的轴心时代。

儒学也被称为礼学,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都是与儒学及其所传承的礼仪制度密不可分的。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中华古文明的起源模式并不是单一拓展型,而是“满天星斗”^①、遍地开花。在这种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上古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又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于礼乐制度的共同追求和相互影响。

在孔子之前,礼乐在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发育之中,是一种在带有部落

^① 苏秉琦先生于 1986 年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详见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 年第 8 期。

联盟遗留因素的封邦建国的国家形态下，凝聚族群、教化百姓、划分等级、标志秩序、拱卫社稷的政治礼仪制度。这种政治礼仪制度在其几千年远古农业文明状态下经过漫长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到西周时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易》《书》《礼》《乐》《诗》《春秋》就是这种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最终成果。

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①。《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②用现代的话说，《六艺》就是西周王朝维护统治、管理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现代立宪国家的宪法有相似之处。《六艺》在西周王朝，并非像后世一样，是作为一种形而上的“道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存在，而是一种形而下的实实在在的典章制度建设，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代表国家意志的统治手段，只不过这种统治手段的风格与后世有所不同，是以“礼乐”而行教化，带有浓重的“文质彬彬”的色彩。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周王朝不具备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手段，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③，礼乐不能安定社稷就代之以“征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④，封邦建国制度设计的第一目的就是要把各个邦国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血缘亲族的手里以卫护中央政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⑤“祀”属于礼乐，“戎”就是征伐。可见西周王朝在巩固统治方面是礼乐与征伐并重的，只不过礼乐在上，征伐在下，礼乐是制度，征伐是手段，手段是用来保护制度。但说到底，无论是制度还是手段，都属于形而下的“用”的范畴，是用来统治天下的。章学诚引用《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解读《易》《书》《礼》《乐》《诗》《春秋》等六经：“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为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⑥

① 此处之“六艺”指大六艺，而非通常所指“礼乐射御书数”之小六艺。

② 见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第一》（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③ 见《论语·季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 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⑤ 见《左传·成公十三年》。

⑥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在孔子的时代,以六艺为“器”的礼乐制度,作为中国古文明的一种最高形式的政治构架,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让孔子终其一生都为之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就是对这种以六艺为器的礼乐制度处于崩溃状态的真实描述。

何谓以六艺为器的礼乐制度?就是“官师治教合一”。章学诚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①余英时先生对这段话解释说:“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是合一的,学者还没有一种超越的观点(‘心无越思’),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职位上考虑具体的问题(‘器’),而不能对政治社会秩序的本质(‘道’)有整体的理解。但在孔子以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禀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并且都自以为看到了‘道’的全貌。”^②

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中国人的思想被囿于作为政治制度的“礼乐”之中,先民中有能力进行思考和表达的人们都在“礼乐”制度中担任一定的官职,即代替天子掌握“器”去统治教化万民的职官,所谓“《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就是对他们具体官职的分工描述。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完善统治、巩固秩序,而不是用自身独立的思维利剑去穿透这些人为建立起来的事物与现象,达到一种超越的观察和辨析世界万物的自由思想境界。

春秋时期(前772—前481),周室东迁,周王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权被各个轮流称霸称雄的诸侯邦国急剧压缩,几近崩溃的边缘。既然周王朝是用以军事征伐为后盾的礼乐制度去管理天下,当其在军事上任人宰割的时候,其礼乐制度也就失去了赖以推行的实力基础,“礼崩乐坏”的残酷现实也就随之成

①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② 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哲学突破与内向超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为必然的事情。“礼崩乐坏”的具体内涵之一，就是东周王室在诸侯争霸的局面下苟延残喘，无力推行《易》、《书》、《礼》、《乐》、《诗》、《春秋》等六艺典章制度，使得六艺作为国家礼乐制度的基本文本堕入因王室的抛弃而失传、湮灭的下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之不存，“祀”将安附？没有国家的武装力量作后盾，礼乐典章便失去了规范、约束天下的必要张力。这就是“周礼尽在鲁矣”^①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作为周公旦的封国，鲁国在周王朝的众多诸侯邦国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就是享有郊祭文王、以后稷配享、立文王庙等特权，在礼仪规格上与周天子庶几相近，得以拥有完备的六艺典章制度。这就是当东周王朝衰微之后，礼仪凋零，六艺流失，天下欲学礼仪之人，纷纷前往鲁国观礼以学的原因。

孔子生在春秋乱世，布衣之家，本与六艺无缘。那些身居高位的鲁国上层贵族也已经不拿一度神圣无比的六艺当一回事，整日沉浸于侵伐淫乐之中。孔子作为鲁国一个下级武士的后代，却因缘际会，与作为周王朝典章制度的六艺发生了终生不渝的亲密关系，以“克己复礼”^②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③，试图以一己之力，恢复六艺本来承担的教化万民、匡扶社稷的神圣功能。从来治天下者，文治武功缺一不可，夫子不是不察，是不能也！但作为一位以天道和人间秩序为己任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孔子终其一生，“一以贯之”^④，为追求重新实现周公开创的西周礼乐文明，重新实现以六艺教化万民、秩序天下的理想社会而劳碌奔波，“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⑤，直至华发苍面、风烛残年，却终不得为世所用。夫子不馁，退而删述六艺，把六艺从制度典章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可以广泛交流、讨论、扬弃、传承的学术思想，并为六艺注入新的精神——孔子所开创的士的精神：“士志于道”^⑥，“士不可

① 见《左传·昭公二年》。

② 见《论语·颜渊》。

③ 见《论语·宪问》。

④ 见《论语·里仁》。

⑤ 同上。

⑥ 同上。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①自孔子始，作为官方的形而下的制度操作层面的六艺一变而为民间的形而上的思想层面的六经，由“器”变为“道”。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之门，由此打开。

孔子以六艺为教学内容，以“文、行、忠、信”^②为立身标准，以“仁”、“恕”为精神寄托，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③为行为准则，以天道为信仰，以“有教无类”^④为胸怀，在春秋乱世教育出一大批传承思想、救世济民的顶尖人才，“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⑤。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流派就此产生，其影响至大至深，从而一举奠定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

在孔子之前，“儒”本来是一种原始的担任祭祀相礼工作的职业相士。孔子通过自身的学习、努力、言传身教，赋予“儒”一种崭新的身份内涵。自孔子始，“儒”一变而为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传播思想、干谒诸侯、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的教师和学者。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儒士，他教出的“七十二贤人”乃至“三千弟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群体。

从春秋末期开始，经战国一直到汉初，随着“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⑥这一过程的恶化，天下各邦国的礼乐教育和竹书典籍几乎都凋零殆尽，出现了空前的教育危机和典籍教材的空白。由于孔子的出现，鲁国成为唯一的礼乐诗书的传承教育和典籍教材存留的国家，因而也就成了向天下其他国家输出教育人才资源和典籍资源的国家。那个时代，在鲁国通往其他国家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身着儒者衣冠的鲁国儒生携带着成箱累筐的竹简帛书，往来于风尘仆仆之间，去往各个国家教授那里翘首以待的子弟。这些成箱累筐的竹简帛书，就是经孔子之手删述流传下来的六艺典籍。在孔子之

① 见《论语·泰伯》。

② 见《史记·孔子世家》（岳麓书社1993年版）：“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③ 见《论语·泰伯》。

④ 见《论语·卫灵公》。

⑤ 见《史记·孔子世家》。

⑥ 同上。

后,这些典籍被他的弟子们尊称为“六经”。

孔子创办私学、修起“六经”、建立了儒家学派之后,在儒学的传播、滋润与启迪下,古老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各种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这就是被后世所称道(或者诟病)的诸子百家。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骤然降临。

“墨”出于儒^①，“法”出于儒^②，“名”出于儒^③，“阴阳”出于儒^④，齐国的稷下学宫也挤满了儒学才俊，“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⑤。即使那位睥睨天下、汪洋恣肆的庄子，也不外乎出于儒门。^⑥至于那位被道家尊为始祖的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则是一个被人说烂了的话题。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如果孔子确实曾到东周王朝的首都去拜访过那位身为东周朝廷史官的老聃，这位与孔子对话的老聃也应该不是《老子》五千言的作者，因为《老子》应该是在战国人李耳手上成书。而这位姓李名耳被后世称为老子并作《老子》五千言的人，则比孔子至少小了一百一十一岁。^⑦考虑到《老子》五千言的内容与孔子之前的原儒在精神实质上庶几相通，^⑧与孔子所创孔门之儒可谓同源而异流，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亦出于儒(原儒)，则应该是一个可以得到史籍佐证的结论。虽然“道家”之称，要到后世的西汉才出现在文字记载之中。

① 钱穆《国史大纲·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言：“据说墨子亦在孔门受过教。(此《淮南子》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注76：“墨子出于六艺传统，受儒者之业，其说见于《淮南子·主术训》与《要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已引之。”

② 法家的两大支柱李斯、韩非皆荀卿之弟子。

③ 孔子首倡“正名”，见于《论语·子路》。此为“名”这一学术概念的由来。

④ 《周易》为“阴阳”概念的发端(或者更可推到《连山》《归藏》二易，但后世二易失传，仅《周易》因孔门而传世，故言之)。孔子作《易传》，《周易》因之传世。《易经》乃孔门所传，已为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所证。

⑤ 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引徐干《中论·亡国篇》。

⑥ 见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三·汉志六艺第十三》：“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二子皆子夏氏门人，去圣未远。”

⑦ 详见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

⑧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孔子的近祖》所引证之《金人铭》和《考父鼎铭文》。

孔子的时代，世间本无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献家、历史学家……孔子的本意，不过是想做一个现世的政治家，造福于当代而已。因不得用，故退而求其次，创办私学，删述、修起《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兹作为教材以教书育人。却于不经意间为中华民族创设了蔚为大观的文化道统，使之传承两千余年而生生不息，历尽万般劫难而昂然挺立。此乃孔子删述、修起六经，并传之于后世之功也。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①

孔子启开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并用自己的文化理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

^① 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一编·第二十五章：孔子》（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目 录

绪论 启门者 / 1

第一章 孔子之前的“天下” / 1

第二章 孔子的先祖 / 13

第三章 孔子的诞生 / 36

第四章 童年与少年 / 47

第五章 弱冠孔子 / 60

第六章 三十而立 / 69

第七章 快乐的孔子 / 81

第八章 孔子与老子 / 87

第九章 去鲁适齐 / 105

第十章 处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 / 117

第十一章 孔子之于《诗》 / 129

第十二章 孔子之于《乐》 / 139

第十三章 孔子之于《礼》 / 147

第十四章 孔子之于《书》 / 156

第十五章 孔子相鲁 / 186

第十六章 周游列国(上) / 210

第十七章 周游列国(下) / 239

第十八章 孔子之于《易》 / 275

第十九章 晚年在鲁 / 313

第二十章 孔子之于《春秋》 / 338

第二十一章 孔子之死 / 370

第二十二章 孔子身后 / 384

结语 创设者 / 405

附录一 孔子年谱 / 427

附录二 孔子的天命与儒者的宿命 / 457

跋 / 466

第一章 孔子之前的“天下”

在孔子之前，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经过几千年、乃至上万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冲突与融合，先民们已经形成了以“华夏”为共同归属概念的大的族群。在地理概念上，华夏族群居住的这块辽阔的土地被称之为“天下”。

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那是一个朦胧的历史时期，因其朦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搭乘时光飞船回溯到那个年代，也许会发觉那时的中国比之今天更加可爱也更加有趣一些。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学者们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那个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先民们的生存环境——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 3°C 。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充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考古学家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记载了他于 1916 年春天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搜求殷墟甲骨的时候，收集到了象匕、象蹄、象牙、象齿等殷代先人遗物。古生物学家杨钟键在出版于 1936 年《中国古生物学志》中也提到，在河南安阳殷墟（约前 1400—前 1100）遗址中发现了象、獭、水牛等属于热带动物的遗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不少关于象的记载。在当代的气候条件下，亚洲象只能生活在云南南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而野生獭的生存环境则局限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沼泽和森林中。这些只能生

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古动物遗骸出现在中原地带的殷墟，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黄河流域气候的温暖和潮湿程度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国上古时期流传着“十日并出，羿射九日”的神话。《诗经》里不断出现歌颂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水稻和桑田诗句，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主要的农作物是麦子和玉米这些旱地作物，但西周乃至更早的年代情况则不然，《诗经·豳风·七月》里唱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诗经·唐风·鸛羽》则控诉道：“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看来，当时黄河流域的确与今天大不相同，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至于当时的长江流域，因为实在太热，所以史籍上有“岛夷卉服”的记载（岛夷即当时的扬州人，也被称为“越人”），当时的越人热得只好整天光着膀子，“断发文身”，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成“衣服”遮住羞处，其气候环境和今天的南洋诸岛很有一比。^①

比气候的温暖更加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原始汉语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肃慎、勿吉、靺鞨、女真等通古斯部落（他们都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与东夷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东夷部落似乎也属于通古斯民族，与以龙图腾为主要崇拜物的华夏部族有所区别），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柔然、契丹部族等，还有严允、熏鬻、鬼方、匈奴等部族都频繁活动在黄河流域，与尧舜禹汤的华夏部落联盟密切互动，有的或者干脆就是尧舜禹汤华夏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他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流，语言不能准确地表达意思就代之以手势，属于阿尔泰语系和通古斯语系的原始复合音节词句与属于缅藏语系的原始单音节词句交替使用，竞争激烈。直到形象思维发达的中国上古先民们发明了原始汉字（古代典籍的记载把这一伟大发明归功于黄帝的史臣“苍颉”，但“苍颉”这个名字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苍”形容草色，可以引申为众多之意，“颉”乃直项，可以引申为高贵的头颅，众多高贵的头颅，就是当时承担祭祀的巫师阶层，巫师阶层是原始部族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管理者），使用单音节原始汉语的先民们才在语言的交流和

① 参见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第四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版）。

族群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因为原始汉字的单字整体结构形式与原始汉语单音节的发音是统一而和谐的。这种属于缅藏语系的原始汉语和记录这种原始汉语的原始汉字遂成为中原华夏部落联盟的统治语言和文字，用于祭祀和占卜，用于与天神和祖宗神主交流沟通，并代替天神和祖宗神主传达他们对于人间社会的指令和意志。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原始汉语和原始文字就是孔子后来所说“雅言”的前身。

但是，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包括通古斯语言在内的其他语系的上古原始语言并没有马上在中原退出，它们与作为后来形成“雅言”主体的原始汉语被中原华夏民族共同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使得很多复合音节语言词汇成功地融入后来的“雅言”之中。使用复合音节语言的上古先民大概也曾经试图用原始汉字去系统地纪录这些复合音节语言，就像后来的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使用汉字去系统地纪录他们的复合音节语言一样。这些记录了部分复合音节语言的原始汉字文本与记录原始汉语的《尚书》一样被留存了下来，司马迁的时代还能看到这些文本。所以太史公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①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即使是很有学问的学者（荐绅先生），也已经没有能力去辨认这种记录着上古复合音节语言的“百家”文本了。

语言体系的成熟和原始汉字的发明与使用，使得华夏族群获得了有效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的能力。这种掌握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使得华夏族群获得了空前的凝聚力，也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的竞争（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中占有了不可逆转的优势。他们使用这种信息方式与天地祖宗沟通，并代表天地祖宗表达意志；他们使用这种信息方式组织族群、划分等级、规范秩序、记载历史、交流经验、传递知识、认识自然、开发技术、扩大生产、改善生活……他们由之在生产、生活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和领先优势，一个以华夏为共同概念的庞大族群联盟变得紧密与强大起来。

^① 见《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族群联盟的中心就是以龙图腾为主要崇拜物的黄帝部落。是他们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原始汉字，从而拥有了与天地祖宗对话的特权。这个部落的核心是巫师阶层，而那位被称为“黄帝”的人，是在与天地祖宗的对话中最有灵验的巫师，是天地祖宗诸神的代言人，是“天的儿子”。

这个族群的四周，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众多部落群体，具体数目不详，但绝不是用“东西南北”这样四个方向性名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实际上，即使在黄河中下流域的中心地带，也依然是一种“华、戎”杂处或者是“华、夷”杂处的局面。

钱穆先生论曰：“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华夏部族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落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①

钱穆先生所论应大致符合上古时代的情景，但还需详加分疏，才能更加贴近上古的真实状态。

实际上，东南西北之“夷狄蛮戎”，不能统而论之，不能把他们都统称为“游牧部落”；即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与“诸夏”杂处的“戎狄”也不能统而论之，更不能用“游牧部落”概括之。

当时“诸夏”部族先民眼中所谓的“南蛮”，实际上是指当时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南的长江流域的先民。近代出土的文物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那里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文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几乎同时期发展的良渚文化，主要以雕刻精美、造型独特的玉石

^① 见钱穆《国史大纲·霸政时期·霸前时期之形势》。

作为礼器。到了黄河流域进入以青铜器为标志的夏商礼乐时代，那些地区先民在同时发展出了与黄河流域礼乐文明相媲美的成熟的礼乐文明社会，并且与黄河流域建立了往来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出土文物和古文化研究都证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是夏禹活动的主要地域之一，属于禹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断发文身”、“岛夷卉服”，只是因特殊的气候条件形成的特殊装束而已，并不代表他们的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原。他们的生存方式既然早就以农耕为主，当然不能把他们称之为“游牧部落”。

至于处于东方海岱（齐鲁）地区“东夷”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部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与“诸夏”融为一体，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龙山文化对应的东夷虞舜部落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时期）内主导着“诸夏”文化。“夷”的字形是人携带着弓，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海岱（齐鲁）地区的居民是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是一个由众多善于射猎的部落组合成部族群体。公元前4100—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和紧随其后的（前3000—前2000）龙山文化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文化。有出土文物和相关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直到龙山文化的鼎盛期，“东夷”人发展出了以“空足鬲”为标志的酒礼文化（酒礼文化出现的前提是粮食的丰收，即农耕技术的提高），把中国的古礼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以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向西推进，直接影响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的形成与发展（以陶鬲为标志），并把影响延伸到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酒礼制度是夏商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从礼制体系上看，龙山时期与夏商时期一脉相承，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大致相同……龙山与夏商时期是使用酒礼器的阶段。而夏商时期的突出变化是青铜酒礼器的出现。”^①

如果我们把古代典籍与出土文物对照来看，兴盛于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是以彩陶礼器为其标志的，相当于上古三代文明的“尧”时期，“尧”即

^① 见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第四章·第五节》（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